

輔導諮商人員與政治暴力創傷當事人 工作之專業知能與策略初探

Exploration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Professionals' Competencies and Strategies for Working with Survivors of Political Trauma

鄭全盛¹、姜兆眉²

Chuan-Sheng Cheng¹, Chao-Mei Chiang²

摘要

政治暴力 (political violence) 緊密鑲嵌於人類歷史的發展，從古至今的戰爭、殖民與種族滅絕，在在體現掌握權力的當權者／國家／政權為了達成特定政治目標，針對特定群體施以迫害。這些迫害可能衍生政治暴力創傷 (political trauma)，造成受暴者之身心、家庭與社群關係的衝擊，並帶來跨越世代的影響。是以，投身於此議題之實務工作時，輔導諮商人員需時刻檢視自身價值觀以及伴隨而來的影響，尤其是自身政治認同及政治議題之價值觀點；因而能在避免損及當事人權益福祉之時，同步正視政治暴力議題之複雜與敏感，並陪伴當事人重新梳理其政治暴力創傷經驗。考量當前政治暴力、政治暴力創傷議題於輔導諮商領域的討論付之闕如，本文嘗試將政治暴力、政治暴力創傷議題置於全球與臺灣脈絡並加以探討；其次，筆者以政治暴力創傷知能、輔導諮商專業知能，以及多元文化與社會正義諮商知能等三面向為架構，建構輔導諮商人員與政治暴力創傷議題工作專業知能準備與工作策略。希冀拋磚引玉，以提升輔導諮商人員於政治暴力創傷議題之關注與開展後續對話。

關鍵詞：政治暴力、政治暴力創傷、多元文化與社會正義諮商知能、輔導諮商

¹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學士班學生

²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副教授兼學生事務處學生輔導中心主任

通訊作者：姜兆眉，(106)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129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Email: cmchiang@ntnu.edu.tw



壹、前言

臺灣社會大眾對於政治暴力創傷議題之理解，快速發展於2018年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簡稱促轉會³）成立之後。藉由將助人專業協助納入轉型正義的範疇，不僅以金錢賠償，更全面地回復政治受難者⁴與其家庭受損的權利，冀望藉此彌補其所承受的政治暴力創傷。然而，汪宏倫（2021）提醒「轉型正義」的定義與範疇涉及多種詮釋，因此使用可能造成「指涉不清」與「誤導」的風險；更指出不同政治立場所擁戴的「集體記憶典範」或有衝突，在「根本的政治轉化尚未完成」的脈絡下推行轉型正義，可能傷及臺灣「政治共同體的道德基礎」。儘管轉型正義於臺灣的推行面臨許多爭議與質疑，然而藉由促轉會的運作與積極推廣，社會大眾與助人專業工作者已逐步認識政治暴力創傷之內涵與影響。

此外，2019年香港發生「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簡稱反送中運動），該運動對彼時香港人民與就學於香港之臺灣學生所造成的衝擊與影響，亦得含括於政治暴力創傷的範疇。為了能妥善回應與承接該議題的當事人，輔導諮商人員（以下簡稱輔諮人員）必須回頭檢視自身對於政治暴力創傷的理解，正視政治對個體的影響力，輔諮人員亦於此歷程持續反思自身之政治立場、價值觀，並延伸理解政治暴力創傷議題對當事人的影響。

考量當前臺灣輔導諮商領域對於政治暴力創傷議題相關討論付之闕如，筆者為文希冀提升輔諮人員對於政治暴力創傷議題之敏感度與實務工作準備度。以下先行簡介政治暴力相關內涵、接續呈現政治暴力創傷文獻整理，並呈現全球與臺灣在地觀點與相關研究論述。依據上述相關文獻，筆者於文章後半部嘗試提出輔諮人員與政治暴力創傷議題工作之準備與策略架構。

貳、政治暴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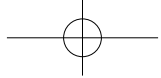
以下說明政治暴力之全球觀點，接續呈現臺灣在地脈絡對於政治暴力之定義與相關論述。

一、全球觀點

「政治暴力」於2002年由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世界暴力與健康報告》（World Report on Violence and Health）正式提出，WHO將「使用暴力手段達成特定政治、經濟與社會目的」之行徑，定義為集體暴力（collective violence），惟因著目的不同分為政治暴力、經濟暴力與社會暴力（Krug et al., 2002）。Sousa（2013）則聚焦「政治暴力」為統治者或統治群體為達政治目的而刻意濫用權力或武力，威脅並傷害特定群體的身心福祉的作為。由於政治暴力的型態與分析取徑過於紛雜，Kalyvas（2019）進而以政治暴力的加害者與目標為兩個角色，將政

³行政院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於2018年成立，於2022年完成任務依規定解散。相關訊息可參閱：http://webarchive-sys.ncl.edu.tw/disk6/30/202204000030/8765606641/web/TJC_GOV/INDEX.HTM

⁴本文以「受暴者」指稱遭遇政治暴力創傷的當事人，惟考量用語脈絡，當提及臺灣228事件與白色恐怖事件的當事人時，沿用促轉會計畫報告使用之「受難者」。本文當中「受暴者」與「受難者」原文皆為victims。



治暴力區分為國家對國家、國家對非國家、非國家對國家以及非國家對非國家四種形式；另外，其更指出在分析不同形式的政治暴力時，仍須留意戰爭、政治體制、經濟發展與種族分化等脈絡情境與政治暴力的關聯。根據上述，政治暴力發生的背景脈絡、目的、形式，以及運作機制有相當大的差異。

由於政治暴力呈現樣態相當複雜，因而受暴經驗亦具有高度殊異性。對於遭受威權統治迫害的受暴者而言，他們可能經歷不法監禁、折磨、暗殺與強迫消失（forced disappearance）（Heeke et al., 2015; Munczek & Tuber, 1998）。另外，因戰亂與社會動盪而需離開原居地的難民或移民於遷徙前、遷徙途中，以及遷徙後可能分別經驗多重暴力與負面處境，例如：遷徙前可能長期處於原居地動盪與戰亂帶來的不安，並遭逢親人死傷，甚至親身遭遇攻擊；於遷徙歷程亦可能經歷肢體傷害、性暴力、綁架等事件；遷徙後，亦可能面對語言與文化適應、求職等難題（Cardoso, 2018; Warr, 2010）。由此可見，政治暴力受暴者不僅受到統治群體控制手段所影響，其受暴經歷更涵蓋暴力事件後被迫調整的生活方式，以及調適過程遇到的阻礙。

二、臺灣觀點

政治暴力當前已有上述定義以及相關研究論述，惟政治暴力的發生、經歷與影響，始終需回到所在之國情與文化脈絡。臺灣歷經威權的重要政治暴力事件，一為1947年因查緝私菸導致的流血衝突，而後引發血腥鎮壓的228事件；二為長達四十多年，由威權統治者以軍事審判體系與國安情治系統，進行體制化的嚴密監控並任意拘禁、逮捕，甚至殺

害異議分子的白色恐怖事件（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2022）。

228事件中，國家以軍事鎮壓人民抗爭，恣意逮捕與處決示威民眾、批判政府的民意代表、律師，以及促進和談的仕紳與政治菁英，藉由暴力迫使民眾不敢對執政當局表達異議（王婉禎等人，2022；彭仁郁，2022）。而歷時超過四十年的白色恐怖時期，統治者透過《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戒嚴令》、《懲治叛亂條例》、《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建立嚴密法網，進行高度制度化、組織化的全面禁制，對人民造成司法與行政上之不法侵害（周婉窈，2022；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2022）。這些屠殺與壓迫在在揭示威權體制於臺灣歷史所留下的難以磨滅之傷痕。

有鑑於228事件與白色恐怖在臺灣歷史與文化深具脈絡性，彭仁郁（2022）參考《國際刑事法庭羅馬規約》第7條對於危害人類罪（crime against humanity）的定義，認為政治暴力是：「握有實質政治權力及資源的群體或個人，以鞏固政權、維持其結構優勢為目的，有系統且大規模地對其掌控下的弱勢群體或個人，進行在身體、心理、經濟、環境、文化／象徵……等不同生命層次上的迫害，甚至滅絕。」（頁33）依此定義，彼時臺灣政治暴力彰顯在威權政府於權力極端失衡的狀況下，透過軍隊暴力虐殺民眾、利用情治系統與司法制度任意侵犯人身自由，以及藉由教育、文化、媒體等手段，予以政治犯赤化與顛覆國家的指控（李禎祥，2015a，2015b；彭仁郁，2022）；藉由將赤裸的政治暴力隱匿於政治犯的標籤之下，當權者因而能正當化其作為。筆者認為，因著臺灣在地脈絡的獨特性，政治暴力的定義相對於上述世衛定義（Krug et al., 2002）更為聚焦與明確。



參、政治暴力創傷

此段落簡要回顧當前國內外政治暴力創傷，以及原住民族政治暴力創傷經驗相關論述與研究。

一、全球觀點下政治暴力之衝擊

普遍而言，政治暴力事件對個體的影響，可能顯現在武器與傳染病而提高的死亡率，因戰事導致的營養不良而惡化的身體狀況，以及因動盪導致的憂鬱、焦慮、創傷後壓力症，以及自殺意念等心理困擾（Canetti et al., 2017; Krug et al., 2002）。相較於未受到政治暴力影響的當事人，Eisenman等人（2003）發現曾遭逢政治暴力經驗的當事人，更常提及罹患慢性疼痛以及因生理問題導致的困擾，以及可能符合憂鬱、焦慮等心理疾患的診斷標準。此外，遭受政治暴力的程度越高，當事人愈可能具強烈的攻擊行為、敵意、憂鬱、與創傷後壓力症（Al-Krenawi & Graham, 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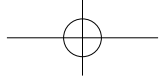
然而，政治暴力與心理衝擊之間並非存在直接的線性因果關係。性別、社經條件、宗教、家長教育背景等社會與人口（social-demographic）因子，以及心理衛生系統、社會支持系統、經濟水平與社會人口變項等脈絡性條件可能都是影響創傷發展的保護或風險因子（Al-Krenawi & Graham, 2012; Tol, 2010）。Srinivasa Murthy更（2007）指出，面對大規模暴力帶來心理衝擊時，女性、兒少族群、長者、身障人士等脆弱族群可能遭逢更多風險；而遭受越多身體與心理創傷者，其心理疾患與症狀可能愈顯著。由此可見，政治暴力本身即可能惡化身心狀態，是以理解政治暴力創傷時，

亟需敏感於其衝擊造成個體不同面向的影響。

二、臺灣觀點下政治暴力之衝擊

臺灣脈絡的政治暴力樣態有別於國外戰亂情事，政治暴力受難者的身心衝擊亦有不同。在228事件中，暴露於政府的血腥鎮壓、屠殺、洗劫等全面且直接的暴力鎮壓時，個體所蒙受的身心衝擊類似於前述戰爭受害者的身心衝擊。然而，白色恐怖時期高度制度性與組織化的壓迫則帶來更長期與更全面的影響。從審訊、關押到服刑期間，受難者面臨劇烈耗弱身心的不當對待與酷刑，致使其在個體層次上經歷長期的身心症狀、主體性與自我認同的瓦解、獄後持續生活受阻以及創傷無以言說的苦悶；關係層次上，則遭逢信任瓦解與關係重建困難、家庭關係質變等全面的衝擊（王婉禎等人，2022；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2022；徐鈺婷，2023；彭仁郁，2022；彭榮邦等人；2020-2021）。

沈秀華（2015）認為臺灣的政治暴力創傷影響不只傷害了受難者，其衝擊更波及與受難者處於同個世代的家庭成員以及子代。這些家庭面臨親人離去卻無法言說與哀悼的苦悶、經濟支柱頓失而導致的財務困境；也因為與身為政治犯的家屬連繫而受到情治單位監視與騷擾，甚至進一步遭到親友、社區、學校與職場的排除與孤立（沈秀華，2015；許雪姬，2015；彭仁郁，2022）。這些經驗可能致使家庭成員產生強烈的身心症狀；同時伴隨親子關係瀰漫莫名的疏離與空洞、無法言明的不安、難以跨越的隔閡，抑或是暴力與衝突；甚者，社會性與象徵性的暴力截斷這些家庭的社會連結、剝奪他們參與社群與人來往的



機會，並抹消他們以人的姿態寓居於世的可能（沈秀華，2015；陳亭瑄，2021；彭仁郁，2022；彭榮邦等人，2020-2021）。儘管世代更迭，社會排除效應跨世代的持續，將政治受難家族推向「孤島」般的存在（彭榮邦等人，2020-2021）。

上述學者的論點亦能呼應宮地尚子（2007/2020）對創傷議題的觀察，認為創傷事件之所以消失於群眾的視野，源於事件本身的危害與痛苦即可能造成受暴者死亡；對試圖發聲的受暴者而言，也可能因為恐懼與創傷帶來的痛苦而難以言明。此外，籠罩於政治暴力陰霾當中的助人專業，對於政治暴力創傷的無感與迴避更加深了「孤島」的禁忌感與邊緣處境（彭榮邦等人，2020-2021）。倘若整體社會無法肯認政治暴力創傷對個體的衝擊、不願聆聽與回應受暴者的痛苦，抑或是不能夠理解邏輯連貫的敘事以外的創傷表達形式（宮地尚子，2007/2020），創傷恐被封印於受暴者心中。是以，筆者以為政治暴力創傷需要社會環境與專業社群正視與聆聽，方能理解受暴者的處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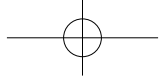
肆、原住民族遭受政治暴力的創傷經驗

自17世紀以來，世界各地的原住民族遭逢殖民政權的壓迫，不論是美洲的印地安與阿拉斯加原住民族（American Indian and Alaska Native, AIAN），澳洲原住民族（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甚或是臺灣的原住民族，皆經驗來自殖民者的諸多暴行：種族屠殺、強制遷離原生土地、寄宿學校政策，與禁止傳統文化靈性接觸（Ciwang Teyra, 2017; Evans-Campbell, 2008; Legters, 1988; Menzies, 2019; Stannard,

1992）。儘管上述的行徑皆符合前文所提之政治暴力的概念，然而原住民族政治暴力創傷具有殖民歷史之殊異性，因此於此獨立探討。

為了理解自殖民時代積累且橫越多世紀的創傷經驗，Brave Heart於1995年使用「歷史創傷」（historical trauma）的概念探討美洲印第安人的受創經驗，而後續學者則藉此概念描述共享特定認同與歸屬的群體，遭逢大規模的群體創傷，而導致的橫互一生（over lifespan）且跨越世代（across generation）的情緒與心理傷害（Brave Heart, 1998, 2003; Brave Heart et al., 2011; Evans-Campbell, 2008）。Evans-Campbell（2008）指出美洲原住民族的歷史創傷反應（historical trauma response），可能發生於個體、家庭與社群層次。在個體可能出現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罪惡感、悲傷、焦慮與憂鬱等心理與情緒痛苦。歷史創傷可能影響家長的親職功能，抑或造成家庭內的溝通受阻，甚至衍生家庭暴力。最後，社群層次的影響則體現於群體高比例的酒精濫用、身體疾病、傳統文化與價值的消失以及內化種族主義等。

須留意的是，探討臺灣原住民族蒙受的政治暴力創傷，須納入威權與殖民歷史的雙重脈絡（鄧湘漪、日宏煜，2020-2021）。228事件的原住民領袖與菁英份子，為了保護部落與族人的安全，與平地仕紳與執政者合作緩和衝突（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2022）。然而，隨著政治局勢的惡化，原住民族無法倖免於國共戰爭而受牽連，因此在白色恐怖時期，早先於228事件戮力維持和平的知識分子，以及與中共地下黨組織牽連的青年與學生紛紛被逮捕，遭受不當刑求、酷刑、構陷、罪責（鄧湘漪、日宏煜，2020-2021）。原住民族的部落連帶關係相較於漢人社會更加緊密，因而原住



民社群的「個人」受難往往是以個人為核心衍生的家庭、部落甚至是社會之「集體」受難（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2020；鄧湘漪、日宏煜，2020-2021）。

當代臺灣民主化已30餘年，不僅威權時代的政治暴力創傷猶未平復，延續自殖民時代歷史創傷的影響猶存。在集體權利的侵害尚未得到完整彌補之際，臺灣原住民族至今依然不斷受到種族歧視與隱微歧視的傷害，例如：2023年臺大言論自由月「火冒4.05丈」事件，持續在種族認同的議題中掙扎的同時，更無法迴避歷史創傷的持續影響（Ciwang Teyra, 2019；Ciwang Teyra等人，2022）。

遭受威權統治與殖民的雙重迫害，臺灣原住民族受創經驗具高度的複雜性與殊異性，因此，在回應原住民族的政治暴力創傷時，需植基於特定部落之文化脈絡，試圖開展個體、家庭與部落的復原與療癒歷程。

有鑑於不同領域學者所使用的語彙與關注面向不同，探討國外與國內原住民族的政治暴力經驗時，筆者將來自殖民與威權歷史的脈絡一併納入討論。在探討殖民歷史的創傷經驗時，國內外學者多以「歷史創傷」的概念描述（Brave Heart, 1998; Brave Heart et al., 2011; Ciwang Teyra, 2017; Evans-Campbell, 2008）；在理解台灣原住民族於威權時代脈絡中的創傷經驗時，則多以「政治暴力創傷」一詞進行討論（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2020；鄧湘漪、日宏煜，2020-2021）。

伍、輔導諮商人員與政治暴力創傷議題實務工作之準備

促轉會自2018年開始推廣政治暴力創傷知情以及舉辦培訓工作坊，惟輔導諮商專業對政治暴力創傷的討論與相關

研究當前仍尚待累積。輔導人員面對政治暴力創傷議題，無可迴避地需先檢視自身對於「政治」的價值觀點，如同輔導學會輔導與諮商專業倫理守則（2022）指出：「價值影響：輔導人員應覺察自己的價值觀，並尊重當事人的價值觀，不強為當事人做任何的決定，或強制其接受輔導人員的價值觀。」（頁2）。輔導人員覺察自身之政治價值觀點之後，也必須具備政治暴力以及政治暴力創傷的相關知識，方能在此背景知識下，應用輔導諮商專業知能於當事人之政治暴力創傷復原歷程。

承上，筆者嘗試提出整合政治暴力創傷知能、輔導諮商專業知能、多元文化與社會正義諮商知能之模式（圖1），筆者以為輔導人員於政治暴力創傷實務之工作準備，需交集上述三面向之專業知能（圖1之灰色區塊），並於後詳細說明。

一、政治暴力創傷知能

為了貼近遭遇創傷的當事人，輔導人員需要對於創傷的發生、經歷與影響有更多認識，亦須敏感於提供服務時的可能風險。此提醒呼應美國心理學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於2015年提出的創傷知能教育與訓練指引（Guidelines on Trauma Competencies for Education and Training），其指出：「創傷相關知能（trauma-related competency）是指心理學家（psychologist）與暴露於創傷的族群工作時，所需具備的基本知識、態度與技巧。與其他針對一般群體或特定取向（如：認知行為取向）所發展的知能不同，創傷相關知能被定位為可應用於不同創傷經驗的族群、學科領域與理論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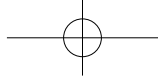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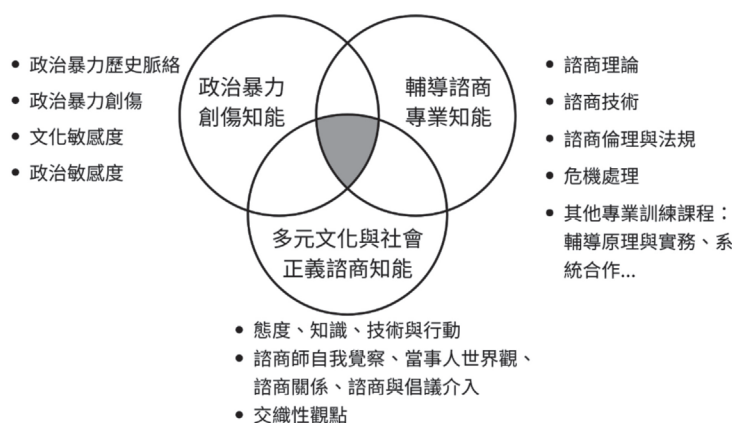


圖1

輔導人員於政治暴力創傷議題之實務工作準備



註：筆者自行繪製

場」(APA, 2015, p. 15)。此外，隸屬於美國諮商學會 (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 [ACA])的諮商與教育相關學程認證委員會 (Council for Accreditation of Counseling & Related Educational Programs, [CACREP]) 亦認為基礎諮商課程需要涵蓋歷史事件、世代創傷、暴力對不同族群的影響，以及這些影響如何體現在發展層面；更需協助學生具備與創傷相關的評估、概念化與諮商的能力 (CACREP, 2023)。

從APA與ACA的觀點可知，輔導人員與創傷當事人工作須包含既有的心理學與輔導諮商訓練，以及創傷相關的特定知能。由於創傷議題廣泛且重視面向各有差異，因此筆者延伸APA的用語，以「政治暴力創傷知能」一詞，提醒輔導人員與政治暴力創傷當事人工作時，不僅需裝備的政治暴力歷史脈絡以及政治暴力創傷等背景知識，亦須掌握以下分述之文化敏感度、政治敏感度以及臺灣脈絡中的政治暴力倖存者之圖像等相關議題。

(一) 文化敏感度

國際戰爭、內亂、針對特定群體壓迫等情事從未止歇，當前有許多組織針對遭遇政治暴力創傷的受暴者提供諮商與心理治療的服務。Warr (2010) 訪談與難民青少年工作的英國諮商師，結果發現植基西方文化脈絡之諮商服務與來自非洲、西亞、東歐難民身處文化脈絡差異甚大，因此諮商師與當事人互動時需有更多的討論與澄清。Kerbage等人 (2020) 也有類似的發現，心理健康專業工作者經常使用精神醫療病理化式的語言，說服敘利亞難民接受心理健康服務。因此，輔導人員需留意當事人身處文化脈絡如何理解「心理諮商」，並調整成當事人能理解的語言層次。

上述研究發現提醒輔導人員需理解當事人身處之文化脈絡，並敏感於諮商與心理治療植基西方脈絡對輔導人員自身、當事人與諮商關係的影響，以避免諮商介入再次壓迫受暴者。

(二) 政治敏感度

與政治暴力創傷議題工作之輔導人員，需敏感於在地與國際當前之政治氛



圍與脈絡，方能更為貼近理解政治暴力創傷對於個體的衝擊，例如：在臺灣過去威權時代下，國家全面的監控與暴力，讓政治暴力受暴者對於人性與社群的信任全盤崩解。更甚，政治暴力形成脈絡充滿著「不可言說」的氛圍，例如：香港反送中運動後移民到英國的香港人，仍然受到政治局勢影響而不敢公然談論自己的身心狀況（Liang & Mental Health Team of Hongkongers in Britain, 2022）。因此，輔諮人員需要在晤談歷程說明對於政治暴力、政治暴力創傷的理解，以讓當事人更感到放心與安全（王婉禎等人，2022；徐鈺婷，2023）。承上，輔諮人員不僅需要敏感與理解政治局勢與氛圍，更需要在晤談歷程「現身」自身對於政治的立場，輔諮人員透明化自身觀點，逐步轉化過去的「不可言說」，而能在諮商晤談歷程當下「娓娓道來」。

（三）臺灣脈絡中的政治暴力倖存者

自2018年促轉會的努力之下，臺灣社會逐漸正視政治暴力受暴者以及政治暴力創傷，許多學者也提醒「政治暴力受暴者」並非只有單一形象。沈秀華（2015）提出「受害者的家屬就是受害者」的論述，試圖肯認轉型正義行動之受害者家屬的主體性。林傳凱（2022）提出90年代以來轉型正義以「冤錯假」案為政治犯平反的論述，導致一種「好政治犯」、「道德上合格的政治犯」的集體想像。因此，輔諮人員需時刻反思，當提及「政治暴力倖存者」時，自己的理解是什麼？是否只有單一的想像或理解呢？輔諮人員重視的應該是回到當事人身上，當事人如何描述「政治暴力」與「政治暴力創傷」？當事人如何描述自己身為「政治暴力受暴者」的這個身份呢？唯有讓當事人擁有論述與命名的權

力，才能避免再製政治暴力之壓迫。

二、輔導諮商專業知能

筆者以為輔諮人員與政治暴力創傷議題工作時，實需以自身輔導與諮商專業訓練以及自身選取之諮商理論學派或取向為基礎，輔以上述「政治暴力創傷知能」，藉此方能了解政治暴力受暴者之脈絡處境前提之下，更能貼近政治暴力受暴者之經驗。而輔導諮商專業知能訓練包含著諮商倫理、諮商理論、諮商技術、危機處理……等相關專業訓練，故於諮商歷程，對於來談主訴議題為政治暴力創傷之當事人，專注聆聽與同理仍是最重要之基本態度。若當事人討論內容觸及法律規定，需打破保密原則進行通報；一旦當事人處於危機狀態，則需及時介入……，上述皆是輔諮人員立於輔導諮商專業知能基礎之上之專業作為。

政治暴力創傷工作之策略，以上述政治暴力創傷知能的背景知識為基礎，因著不同諮商理論學派之理論哲學觀點，而有著不同諮商介入面向，例如：心理動力取向會關注當事人的早期經驗、認知行為取向則從當事人對於政治暴力受暴經驗的想法為工作切入點……等。輔諮人員也需清楚覺察自身人性觀點，以及對應的諮商理論學派，因而能選擇諮商理論學派與當事人工作。故與政治暴力受暴者之當事人工作時所選擇的諮商理論學派，仍須以輔諮人員自身人性觀點為基礎選擇的諮商理論學派，並不是「政治暴力受暴者」適合哪一種諮商理論學派。基於上述，此段落將以選擇敘事治療學派之輔諮人員，簡述與政治暴力受暴者進行諮商晤談時的眼光與思考。



敘事治療學派之輔諮人員需具備第一點政治暴力創傷知能相關知識，輔諮人員不僅理解當事人所言，更能將當事人感受想法置於過去與當前政治局勢脈動，看見其緊密關聯。植基於敘事治療理論概念，輔諮人員抱持未知（not knowing）的態度，聆聽與理解當事人的敘說經驗。

此外，由於敘事治療理論相信人的受苦是因為主流論述的壓迫、規訓，致使其無法以個人偏好的方式，活出自身生命並建構生命之意義（姜兆眉等人，2021；White & Epston, 1990），因而輔諮人員從敘事治療角度，聽見當事人身處具壓迫性的「主流論述」。例如：在過去威權統治時期，主流論述可能是國家以法律制度、教育、媒體強加的「政治犯」標籤（彭榮邦等人，2020-2021）；而在當前社會，「放下、原諒就能和解」也是對於政治暴力受難者的主流論述之一（彭仁郁，2022）。輔諮人員會看到當事人對於自身的認同，容易被主流論述所取代，故在晤談歷程中，邀請當事人以自己想要的方式描述自身，以及想要過的生活，甚至表達對於當前主流論述的不同意見。是以，當事人每次的敘說都是展現自身「偏好的故事」（preferred stories），同時也是對於當前主流論述重要的抵抗。

因此，基於敘事治療學派，輔諮人員能夠敏感於社會當中對於政治暴力受暴者的想像或框架，同時維持著「未知」的眼光與立場，邀請並聆聽當事人於政治暴力受暴經驗的敘說或者是拒絕不說，當事人言說與否都是其主體性的展現。

三、多元文化與社會正義諮商知能

透過「政治暴力創傷知能」與「輔導諮商專業知能」的整合下，輔諮人員大致具備政治暴力創傷議題工作之理論基礎，筆者認為Ratts等人（2015）提出的多元文化與社會正義諮商知能（Multicultural and Social Justice Counseling Competencies, MSJCC）提供輔諮人員於政治暴力議題的反思基礎，更能藉此對於自身於政治之價值觀更清晰，使其於實務工作得以辨明自身立場，而能有所為與有所不為。

以下圖2所示，Ratts等人（引自高智龍、賴念華，2016，頁33）將多元文化與社會正義諮商知能分為四個層次：諮商員⁵的自我覺察、當事人的世界觀、諮商關係與諮商與倡議介入，在前三個層次中各自都有態度與信念、知識、技術與行動四個面向，至於諮商與倡議則涉及個體到體制層面。筆者以為輔諮人員皆須具備多元文化與社會正義諮商知能，並不限於輔諮人員選擇的諮商理論學派而定。意即，輔諮人員無論選擇哪個諮商理論學派，皆須以此知能架構反思自身諮商實務。是以，筆者將此架構為基礎，提出輔諮人員面對政治暴力創傷議題時，可以嘗試的反思與行動。

（一）諮商員的自我覺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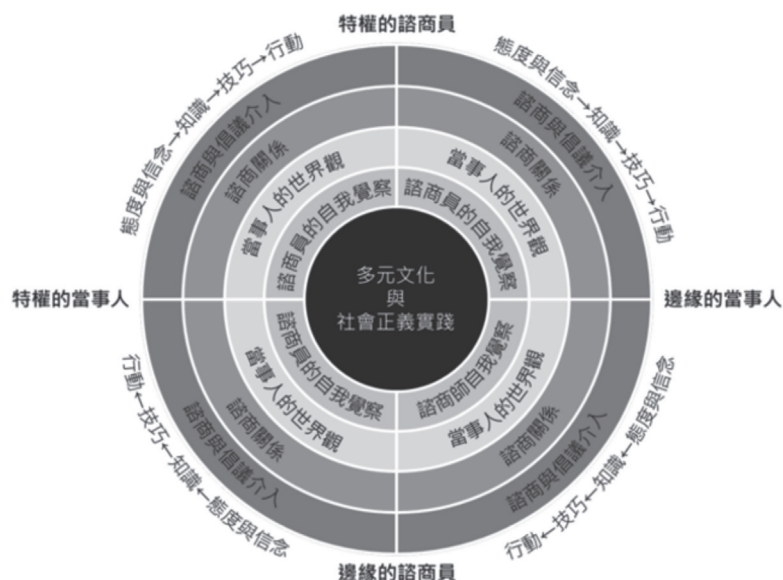
作為實務工作者與研究者，輔諮人員個人的價值、認同與經歷必然形構自身回應政治暴力創傷的位置（positionality）。儘管個人脈絡的經驗可以幫助其連結與理解政治暴力受暴者，倘若未經梳理可能對政治暴力受暴者與諮商關係造成預期之外的影響。

⁵依循Ratts等人（引自高智龍、賴念華，2016，頁33）原文為counselor，故依循原文，此處標題以「諮商員」稱之，文中仍維持「輔諮人員」。



圖2

多元文化與社會正義諮商知能



資料來源：取自高智龍、賴念華（2016，頁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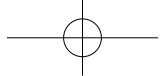
輔諮人員自身可能曾遭逢家庭暴力、性／別暴力等受暴經驗，因著受暴經驗的相似與連結，輔諮人員於諮商晤談歷程中或許能更同理與貼近當事人的受暴經驗；惟輔諮人員同步也須覺察自身類似經驗對於諮商晤談歷程的影響，例如：是否因著自身類似經驗，而「理所當然」地理解當事人的政治暴力受暴經驗，在晤談歷程少了詢問、確認與對話。

再者，即使輔諮人員同樣具備類似政治暴力受暴經驗，也需留意政治暴力受暴經驗並非完全等同於整體生命經驗；輔諮人員將當事人受暴經驗置於整體經驗後，因著其多元交錯社會文化面向，而能更豐富與全面地理解當事人的經驗處境。而因著輔諮人員與當事人的社會文化面向有所類似與不同，雙方可能同屬或分屬圖二當中的特權或邊緣群體。例如：就政治暴力受暴經驗，輔諮人員與當事人皆為圖二之中的邊緣位置，

惟輔諮人員與當事人為不同社經地位，輔諮人員若為中產階級，相對於勞動階級的當事人，前者則位於圖二之中特權位置，後者則是圖二之邊緣位置。故輔諮人員與當事人的特權與邊緣位置實因著其不同社會文化面向而有所變動，這般思考與定位將有助於輔諮人員謹慎使用自身類似於當事人的受暴經驗，避免以自身經驗全然等同於當事人的受暴經驗，而在晤談歷程中簡化對於當事人的理解。

另一方面，倘若輔諮人員過往未有類似受暴經驗，並不代表無法同理或與政治暴力受暴者工作，輔諮人員需高度覺察自身經驗與政治暴力受暴者生命經驗之差異與差距，於晤談之前補足相關背景知識與知能（請見「政治暴力創傷知能」段落所述），以充分準備與當事人之晤談。

由上述討論可發現，在創傷議題實務工作，輔諮人員的位置性



(positionality) 可能受到個人與權力互動的經驗形塑，因而影響個人與專業角色的認同，因著前述認同進而影響其與服務對象的互動與關係。另外，這些多重認同的位置性亦經常帶來複雜的倫理議題：誰有談論創傷的資格與權利、如何以實務工作者或研究者的身分回應創傷、如何與受暴者連結並回應衝突等（宮地尚子，2007/2020）。

對於政治暴力議題，輔諮人員為了明晰於自身位置性並回應其帶來的相關議題，需要高度覺察自身政治價值觀（涵蓋對自由、民主、權力、法治等概念的理解、政治傾向甚或是政黨認同）、自身因社會位置而來的特權與受迫經驗以及自身與政治暴力的關聯性；並反思價值觀、特權與受迫經驗與受暴關聯性對自身世界觀以及專業角色的影響。另外，在知識的面向上，輔諮人員需藉由知識的涵養，幫助其理解自身政治價值觀的形塑歷程以及價值觀的影響歷程；除此之外更需理解特權與受迫經驗植基的結構，以便能深化對自身經驗的認識。而在技巧面向，則可透過反思、批判、分析等能力深化知識層面的理解。最後，在行動面向，透過參與專業課程、認同的政治社群或活動等具體行動增進對自身政治價值與社會脈絡的認識。

（二）當事人的世界觀

輔諮人員以好奇與開放的態度面對政治暴力受暴者及其家庭，對其受暴經驗保持彈性，並且暫時懸置自身對政治暴力事件的價值判斷。另外，在知識的面向，接觸臺灣威權史、政治暴力創傷與受暴者經驗的認識與理解，幫助其貼近受暴者的生命脈絡。此外，針對技巧的面向，輔諮人員可透過聆聽、同理、理解等能力，使其細緻理解受暴者的世界觀；另外，其亦可透過政治暴力創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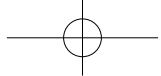
知能的知識辨識受創樣態、連結過往受苦與當下情況、適當回應並避免當事人再度受創。至於行動面向，輔諮人員可透過參與相關單位舉辦的工作坊或活動（例如：國家人權博物館的青年人權體驗營、共生音樂節、政治暴力創傷相關課程）深化自身對於政治暴力創傷經驗的理解。

（三）諮商關係

輔諮人員在態度信念需要對權力議題的高度敏感，以避免「專家」的姿態複製壓迫，並努力讓信任開展於平等的諮商關係。其次，輔諮人員需肯認彼此的政治價值對諮商歷程的影響。接續，輔諮人員透過知識學習幫助自身理解與當事人的政治價值觀點的差異，以及價值觀點伴隨而來的權力位階如何影響助人關係。輔諮人員在展現諮商策略與技巧時，同樣可透過反思、批判、分析、應用等能力，使其敏感於政治價值影響諮商關係得以更為細緻；同時，亦可以上述的「政治暴力創傷知能」的觀點，回應可能的權力失衡。最後，在行動的面向，輔諮人員應透過展開對話與合作建立信任，幫助雙方看見影響諮商關係的政治價值因子、影響途徑與層面。

（四）諮商與倡議介入

輔諮人員於個別諮商時，可幫助受暴者看見自身經歷與威權歷史的關聯並理解受苦的根源，解構充滿自我罪咎的敘事而獲致重構生命意義的可能。輔諮人員在社群層次上，不僅能以個人立場為受暴者發聲，更可以專業社群作為倡議的基礎、積極撐出討論的空間。以性別議題為例，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性別平等委員會所發起的2022「諮商輔導專業人員支持517反恐同／恐跨／恐雙日」行動，即為諮商專業社群回應社會壓迫與不義的具體作為。



如同Herman (2015) 所言：「在公領域談論與研究創傷本身就是個政治問題。」(頁9) 由於政治暴力議題的敏感性，必定會使相關倡議的推動遭逢極大的阻抗，然而專業社群的現身不只可讓社群內部的實務工作者對此議題更加重視，更能讓相關的助人領域甚或是社會大眾意識到該議題的重要與迫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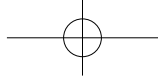
筆者以多元文化與社會正義諮商知能作為輔諮人員介入政治暴力的反思基礎的討論，顯示輔導諮商學界著實有其獨到的視角與豐厚的論述資源，得以回應政治暴力創傷，更可藉此豐厚領域內部政治議題的討論。

陸、結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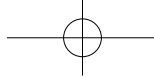
面對國際戰事仍頻，以及國內尚待修復的政治暴力傷痕，輔導諮商專業正視政治暴力與政治暴力創傷議題實刻不容緩。身為輔諮人員，豐富自身理解政治暴力的知能，以期在專業角色回應與承接政治暴力創傷議題。筆者希冀藉此本文嘗試提出思維架構，邀請輔諮人員共同關注政治暴力創傷議題，並且回到自身選取之諮商理論學派開展輔導諮商實務工作策略，期待未來開展更多政治暴力創傷議題之討論空間。

參考文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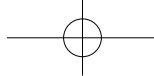
- Ciwang Teyra(2019)。認識歷史創傷與微歧視。原視界，24，60-63。https://insight.ipcf.org.tw/article/160
- Ciwang Teyra、黃炤愷、Lahok Ciwko (2022)。我不夠格嗎？都市原住民青年內外交困的歧視處境。中華心理衛生學刊，35 (3)，249-274。https://doi.org/10.30074/FJMH.202209_35(3).0002
- 王婉禎、朱乃瑩、何雪綾、郭家明、許琬琳、彭仁郁、黃仲玄、蔡昇倍、魏瑄慧 (2022)。聆聽與療癒之路——政治暴力創傷療癒服務工作手冊。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 台灣輔導諮商學會 (2022)。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諮商專業倫理守則。http://www.guidance.org.tw/ethic202210.pdf
- 李禎祥 (2015a)。二二八事件的人權迫害形式。在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 (主編)，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臺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卷一——清理威權遺緒 (頁113-120)。衛城。
- 李禎祥 (2015b)。國家的敵人與充滿敵人的國家。在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 (主編)，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臺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卷一——清理威權遺緒 (頁127-139)。衛城。
- 沈秀華 (2015)。受害家屬就是受害者。在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 (主編)，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臺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卷三——面對未竟之業 (頁99-113)。衛城。
- 周婉窈 (2022)。轉型正義之路：島嶼的過去與未來。玉山社。
- 林傳凱 (2022)。再思台灣脈絡中「政治受害者」與「傷」的本地意涵。本土心理學研究，57，103-118。https://www.airitilibrary.com/Article/Detail?DocID=10298282-N202301180005-00004
-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2020)。促轉會兩年階段性任務成果報告。https://www.ey.gov.tw/tjb/FF667ED3FF38482E
-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2022)。促進正義轉型委員會任務總結報告書。https://gazette2.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8098/ch01/type7/gov01/num2/



- Eg.htm
- 汪宏倫 (2021)。我們能和解共生嗎？：反思台灣的轉型正義與集體記憶。《思想》，42，1-61。https://www.airitilibrary.com/Article/Detail?DocID=a0000477-202104-202105110009-202105110009-1-61
- 宮地尚子 (2020)。療癒心傷 (二版) (李欣怡，譯)。經濟新潮社。(原著出版於2007年)
- 徐鈺婷 (2023)。諮商心理師參與政治暴力創傷助人工作經驗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 高智龍、賴念華 (2016)。從多元文化諮商觀點探討男同志諮商實務。《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46，31-62。https://www.airitilibrary.com/Article/Detail/17285186-201608-201609130007-201609130007-31-62
- 許雪姬編 (2015)。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
- 陳亭瑄 (2021)。生活於政治暴力之後：臺灣二二八與白色恐怖受難者後代之心理經驗探究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
- 彭仁郁 (2022)。「不要碰政治」？—轉型正義療癒工程的心理學介入。《本土心理學研究》，57，3-83。https://doi.org/10.6254/IPRCS.202206_(57).0001
- 彭榮邦、蘇逸人、翁士恆 (2020-2021)。政治暴力受難者主體經驗類型化分析 (計畫編號：TJC1090403)。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https://www.grb.gov.tw/search/planDetail?id=13599839
- 鄧湘漪、日宏煜 (2020-2021)。原住民族政治暴力受難者與家屬需求調查與分析 (計畫編號：TJC1090409)。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https://www.grb.gov.tw/search/planDetail?id=13680061
- Al-Krenawi, A., & Graham, J. R. (2012). The impact of political violence on psychosocial functioning of individuals and families: The case of Palestinian adolescents. *Child and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17*(1), 14-22. https://doi.org/10.1111/j.1475-3588.2011.00600.x
-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15). *Guidelines on trauma competencies for education and training*. http://www.apa.org/ed/resources/trauma-competencies-training.pdf
- Brave Heart, M.Y.H. (1998). The return to the sacred path: Healing the historical trauma response among the Lakota. *Smith College Studies in Social Work, 68*(3), 287-305. https://doi.org/10.1080/00377319809517532
- Brave Heart, M.Y.H. (2003). The historical trauma response among Native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substance abuse: A Lakota illustration. *Journal of Psychoactive Drugs, 35*(1), 7-13. https://doi.org/10.1080/02791072.2003.10399988
- Brave Heart, M.Y.H., Chase, J., Elkins, J., & Altschul, D. B. (2011). Historical trauma among indigenous peoples of the Americas: Concepts, research, and clinical considerations. *Journal of Psychoactive Drug, 43*(4), 282-290. https://doi.org/10.1080/02791072.2011.628913
- Cardoso, J. B. (2018). Running to stand still: Trauma symptoms, coping strategies, and substance use behaviors in unaccompanied migrant youth.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92*, 143-152. https://doi.org/10.1016/j.



- childyouth.2018.04.018
- Canetti, D., Elad-Strenger, J., Lavi, I., Guy, D., & Bar-Tal, D. (2017). Exposure to violence, ethos of conflict, and support for compromise: Surveys in Israel, East Jerusalem, West Bank, and Gaza.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61*(1), 84-113. <https://doi.org/10.1177/0022002715569771>
- Charlson, F., Van Ommeren, M., Flaxman, A., Cornett, J., Whiteford, H., & Saxena, S. (2019). New WHO prevalence estimates of mental disorders in conflict setting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The Lancet, 394*(10194), 240-248. [https://doi.org/10.1016/S0140-6736\(19\)30934-1](https://doi.org/10.1016/S0140-6736(19)30934-1)
- Ciwang Teyra (2017). *Culture and history matter: Historical trauma and cultural protective factors on alcohol use among Truku Tribal People*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 Council for Accreditation of Counseling and Related Educational Programs (2023). *2024 CACREP standards*. <https://www.cacrep.org/wp-content/uploads/2024/04/2024-Standards-Combined-Version-4.11.2024.pdf>
- Eisenman, D. P., Gelberg, L., Liu, H., & Shapiro, M. F. (2003). Mental health and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among adult Latino primary care patients li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previous exposure to political violence. *JAM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90*(5), 627-634. <https://doi.org/10.1001/jama.290.5.627>
- Evans-Campbell, T. (2008). Historical trauma in American Indian/Native Alaska communities: A multilevel framework for exploring impacts on individuals,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23*(3), 316-338. <https://doi.org/10.1177/0886260507312290>
- Heeke, C., Stammel, N., & Knaevelsrud, C. (2015). When hope and grief intersect: Rates and risks of prolonged grief disorder among bereaved individuals and relatives of disappeared persons in Colombia.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173*, 59-64. <https://doi.org/10.1016/j.jad.2014.10.038>
- Herman, J. (2015). *Trauma and recovery: The aftermath of violence – from domestic abuse to political terror*. Basic Books.
- Kerbage, H., Marranconi, F., Chamoun, Y., Brunet, A., Richa, S., & Zaman, S. (2020). Mental health services for Syrian refugees in Lebanon: perceptions and experiences of professionals and refugees.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30*(6), 849-864. <https://doi.org/10.1177/1049732319895241>
- Kalyvas, S. N. (2019). The landscape of political violence. In E. Chenoweth, R. English, A. Gofas, & S. N. Kalyvas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errorism* (pp.11-3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rug, E. G., Dahlberg, L. L., Mercy, J. A., Zwi, A. B., & Lozano, R. (Eds.). (2002). *World report on violence and health*.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 Legters, L. H. (1988). The American genocide. *Policy Studies Journal, 16*(4), 768-777. <https://doi.org/10.1111/j.1541-0072.1988.tb00685.x>
- Liang, M., & Mental Health Team,



- Hongkongers in Britain (2022). *Survey report of mental health amongst Hong Kong arrivals in the United Kingdom*. <https://hongkongers.org.uk/2022/05/mental-survey/>
- Menzies, K. (2019). Understanding the Australian Aboriginal experience of collective, historical and intergenerational trauma.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62(6), 1522-1534. <https://doi.org/10.1177/0020872819870585>
- Munczek, D. S., & Tuber, S. (1998). Political repression and its psychological effects on Honduran children.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47(11), 1699-1713. [https://doi.org/10.1016/S0277-9536\(98\)00252-4](https://doi.org/10.1016/S0277-9536(98)00252-4)
- Ratts, M. J., Singh, A. A., Nassar-McMillan, S., Butler, S. K., & McCullough, J. R. (2015). *Multicultural and social justice counseling competencies*. <https://www.counseling.org/docs/default-source/competencies/multicultural-and-social-justice-counseling-competencies.pdf>
- Sousa, C. A. (2013). Political violence, collective functioning and health: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Medicine, Conflict and Survival*, 29(3), 169-197. <https://doi.org/10.1080/13623699.2013.813109>
- Srinivasa Murthy, R. (2007). Mass violence and mental health – Recent epidemiological finding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Psychiatry*, 19(3), 183-192. <https://doi.org/10.1080/09540260701365460>
- Stannard, D. E. (1992). *American holocaust: The conquest of the New Worl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ol, W. A., Kohrt, B. A., Jordans, M. J., Thapa, S. B., Pettigrew, J., Upadhaya, N., & de Jong, J. T. (2010). Political violence and mental health: a multi-disciplinary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on Nepal.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70(1), 35-44. <https://doi.org/10.1016/j.socscimed.2009.09.037>
- Warr, S. (2010). Counselling refugee young people: An exploration of therapeutic approaches. *Pastoral Care in Education*, 28(4), 269-282. <https://doi.org/10.1080/02643944.2010.481307>
- White, M., & Epston, D. (1990). *Narrative means to therapeutic ends*. W.W. Norton & Company.

投稿日期：113年07月02日

第一次修改日期：113年09月07日

第二次修改日期：114年02月21日

通過日期：114年03月13日

